

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

(1957—1972)

洪紹洋

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將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作為研究對象，瞭解其設立緣由與協助臺灣發展經建計劃。臺灣在1950年代末期美援漸減的背景下，透過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網絡，作為日本資金與技術進入臺灣的媒介。至於1965年簽署的日圓貸款，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所促成。

研究結果發現，臺灣經建計劃對日的資金與技術依賴早自1950年代後期即以成立。但就工業部門而言，1950年代後期起美國所給予的援款即逐漸減少，而日本資本的重要性則逐漸提高，顯示過去對美援的角色及影響似有「過大評價」之虞。

另一方面，政府藉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引進日資投資臺灣的經濟建設，並促成廠商間的技術移轉，可說是藉由「非市場經濟」的方式促成。因此，過去提出臺灣因勞動力品質優越、制度健全、產業政策等因素引來外資之論點，或許有待修正。

關鍵字：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日臺關係、美援、日圓貸款、外國人投資

壹、前言

戰後的臺灣與日本關係，由戰前的殖民地從屬關係，轉換為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其後，隨著兩岸分治，撤守來臺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皆主張「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爭取各國的認同。而日本迫於美國的壓力及國際冷戰情勢，選擇與中華民國建交。¹戰後臺日間政經關係的正常化，係以1952年中日和約的簽訂為嚆矢；至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自1950年代以來的臺日關係不得不作調整。²

實際上，日本面對臺灣與中共間的外交事務時，採行政經分離之原則，但在執行層面上，兩國間的官方往來往往因日本與中共間的經貿交流而陷於停頓。³因此，創設半官方組織作為緩衝，除了作為兩國政府間非正式溝通及反共宣傳的管道外，也促進彼此間經濟和文化之交流。

過去對戰後臺日經貿之研究中，臺灣方面，廖鴻綺針對1950 - 1961年由政府主導的臺日貿易往來進行討論，強調此一時期的貿易是由政府經由談判主導，與1961年以後由商人主導有所區別。⁴另外，劉進慶將1965年的日圓貸款視為支援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性貸款，並定位為日本與臺灣之間「舊殖民地關係」的復活，但劉氏在行文中欠缺對日圓貸款的形成脈絡進行考察。⁵日本方面，雖有《日臺關係史》的出版，但內容偏重兩國政治和外交往來，尤其多著重1950年代臺日經貿重建的討論。⁶

整體而言，過去的研究鮮見從半官方組織的觀點切入，有其美中不

1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編，《日臺關係史（1945 - 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0 - 54、67 - 70。谷正綱，〈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會〉，沈觀鼎編，《為張岳軍先生八十壽 - 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出版不詳，1968年），頁19。

2 黃天才，《中日外交的人與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199 - 225。

3 例如1963年8月日本政府向中共出售維尼龍工場設備，以及同年9月的周鴻慶叛逃事件，都曾使得臺灣與日本間的經貿往來一度中斷。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臺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1980年），頁181 - 196。

4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 - 196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1 - 2、7。

5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頁368 - 370。

6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編，《日臺關係史（1945 - 2008）》。

足之處。在臺日間的半官方組織中，主要先後有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和中日關係研究會。就性質而言，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和中日關係研究會是由臺灣單方面所籌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則由臺日雙方共同組織，對兩國間的政經往來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故重要性遠高前兩者。⁷當時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臺灣代表在政府授意下，適時向日本提出協助我方發展經建計畫的需求，並在1960年代促成日圓貸款的簽署。對日本而言，此一組織實為戰後日本資本與設備輸出到臺灣的重要管道之一。透過對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研究，有助於瞭解臺日兩國間如何在冷戰體系下建立起官民交錯的經貿交流管道。

其次，若由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戰後臺灣的外來援助，大多著重美援對戰後臺灣經濟所帶來的貢獻；或由臺灣內部結構作分析，強調投資環境與產業政策的重要性，使得外資願意來臺投資。⁸然而，上述研究除忽略「政經網絡」扮演之角色外，對日資進入臺灣的過程則著墨不多。是故，本文將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作為研究對象，瞭解其設立緣由、如何促成日資來臺、如何協助臺灣在美援減少下推動經建計畫，以及如何促成日圓貸款等作深入剖析，藉期對早期臺灣經濟發展所提出的論點加以回應。

貳、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創設

中日合作策進會的成立，可上溯到1956年8月日本副總理石井光次郎率領「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訪問臺灣之時，石井氏曾就政治、經濟、文化各議題與總統蔣介石、政府官員、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亞盟中國總會等各界人士交換意見。當時知日派大老張群與石井光次郎會晤時，有感於臺日之間的交流不能僅靠政府間的協商，應共同籌設一

7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25 - 235。

8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 - 1965）》（臺北：自立晚報，1990年）。瞿宛文，〈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頁49 - 93。

組織，為政府間談判之議題先行鋪路。張群將此構想向總統蔣介石報告並獲得認可後，即開始進行籌備。在此基礎下，由臺灣與日本雙方各推出委員12人，內分政治、經濟、文化三組委員會，臺灣方面的召集人由谷正綱擔任，定名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⁹

1957年4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時，宣示此一組織目的為「促進中日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親善友好與互助合作」。此外，會議中亦確認凡是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討論通過或取得諒解的事項，臺灣與日本代表將分別向兩國政府或民間相關機構提出建議，逐一促其實現。¹⁰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創會初期，臺日兩國分別由張群與石井光次郎協助營運。¹¹張群與日本的淵源，除了曾留學日本外，中日戰爭爆發前任職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時，即經常參與對日事務交涉。此外，石井光次郎於1915年至1920年曾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總務長官下村宏的秘書官，對臺灣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¹²

9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26 - 227。谷正綱，〈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頁16。〈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經濟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參考事項〉（1957年8月1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二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 - EAP - 01749，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10 谷正綱，〈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頁16、19。

11 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出版社，1976年），頁402。

12 石井光次郎，〈回想八十八年〉，頁151 - 213。

表1：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發起人資料（1957年）

臺灣方面		
姓名	當時職稱	屬性分類
谷正綱	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常務委員	政治
張厲生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政治
黃朝琴	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副會長	經濟、政治
陶希聖	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兼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政治、經濟
鄭道儒	曾任經濟部部長、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長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濟
胡健中	立法委員、中央日報社社長	政治、文化
林柏壽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濟
陳雪屏	正中書局董事長	文化
羅萬俔	彰化銀行董事長	經濟
吳俊升	教育部政務次長	文化
王撫洲	經濟部次長	經濟
汪公紀	中央信託局顧問、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兼幹事長	經濟
日本方面		
姓名	當時職稱	屬性分類
赤松要	一橋大學教授	文化
井口貞夫	前外務省常務次長	政治
上村健太郎	前防衛廳空軍參謀長	政治
杉道助	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頭	經濟
藤山愛一郎	東京商工會議所會頭	經濟
船田中	眾議院議員	政治
堀越禎三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常任理事	經濟
細川隆元	政治評論家	政治
松岡駒吉	日本社會黨眾議院議員、日本社會黨顧問	政治
御手洗辰雄	政治評論家	政治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總長	文化
矢次一夫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	政治

資料來源：〈中日合作策進會經濟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參考事項〉（1957年8月1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 第二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 - EAP - 01749，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在發起人方面，如表1所示，臺灣方面的發起人身份幾乎全數為黨政要員和公黨營事業負責人。代表臺灣的12名委員中，外省人共計9名，臺灣人僅有黃朝琴、羅萬俤、林柏壽等3名。由上述的人事安排，不難看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核心幹部是以黨政集團為首的外省人為主，反觀臺灣人僅能退居經濟層面。

其中，屬於半山系統的黃朝琴，戰前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至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留學，在美留學期間加入國民黨，畢業後前往中國大陸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官。戰後黃氏曾擔任臺北市市長和臺灣省議會議長，並獲聘為臺灣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¹³羅萬俤戰前畢業於明治大學，之後赴美國賓州大學留學，畢業返臺後籌組臺灣民報社。戰後羅氏曾擔任臺中市參議會參議長、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等職務外，並出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在商業活動上，羅萬俤自1947年獲聘為臺灣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1955年又接任彰化銀行董事長。¹⁴林柏壽則為板橋林家後代，其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戰前曾擔任臺灣商工銀行、林本源維記興業株式會社、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暨事業董事。戰後林氏則擔任臺灣水泥公司、啟業化學公司、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等職務。¹⁵

經由以上的論述，或能顯現出戰後臺灣人在國民黨政權的一黨獨大體制的氛圍下，僅有依附在國民黨政權下，才有參與對日之間的半官方組織的交流與活動。

至於日本方面的人事佈局，政治方面僅有船田中、松岡駒吉兩位眾議員位居日本政界第一線的民意機關；其餘如曾任外務省常務次長的井口貞夫、曾任防衛廳空軍參謀長的上村健太郎、政治評論家細川隆元等，可劃歸為退休官員、政治評論家等二線人物。文化面方面，則有擔任一橋大學校長的赤松要和拓殖學總長矢部貞治。¹⁶值得注意的是，赤松要為日本經濟政策研究者的第一人，曾對日本的產業發展進行觀察，並提出雁行理論。赤松氏參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原因，或許欲借重

13 黃朝琴，《我的回憶》（出版地不詳：黃陳印蓮，1981年）。

14 許雪姬，〈羅萬俤〉，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頁1335。

15 許雪姬，〈黃朝琴〉，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頁481。

16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27 - 228。

其經濟政策的專業，給予臺灣經濟發展方向的建議。¹⁷

反觀經濟面代表，在第一次會議則派出戰前曾任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社長，並且與臺灣關係密切的東京商工會議議長藤山愛一郎擔任經濟組召集人；另外，也邀請經濟團體連合會常務理事堀越禎三、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長杉道助都擔任委員。就發起人所屬的組織來看，東京商工會議所與大阪商工會議所兩個組織，為掌理日本前兩大城市東京與大阪的商工業者所組織的團體，除作為該地企業發展的後援外，並提供所屬成員投資資訊。另外，經濟團體聯合會主要則聯繫日本各地之經濟組織，與政府間保持密切聯繫。由此人事佈局所屬的組織來看，日本對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經濟組的人事佈局著墨頗深，呈現「政冷經熱」的樣態。¹⁸至於政治組代表在日本政界的影響力則稍嫌薄弱，主因或為日方發起人石井光次郎僅為自民黨中的一個派系，無力動員其他黨團之要員所致。¹⁹

如上所述，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日本方面的經濟組成員陣容不容小覷，原因與戰後日本經濟的復興密切相關。眾所皆知，戰後日本在1950年韓戰的契機下獲得大量訂單，並於1955年後進入高度成長期，1957年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創設後，日本在國內市場漸趨飽和下，企業開始尋求向海外擴展，進行商品與技術的輸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業生產的的產品與設備之出口，與日本政府的賠償及援外政策相互結合。例如：東南亞的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等四個國家，依據1951年簽署的舊金山合約向戰敗國日本提出求償，日本則以現金、經濟協力和貸款等方式支付。²⁰具體而言，日本的賠償細目包含協助各國建立水壩、發電廠等公共建設，日本企業則伴隨上述建設興築的過程進入東南亞各國。1957年經濟團體連合會副會長植村甲午郎及通產省企業局賠償室長谷敷寬，也曾先後宣示日本企業應與賠償政策相結合，將

17 池尾愛子，《赤松要：わが体系を乗り越えてゆけ》（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年），頁199-206。

18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27-228。

19 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合報社，1978年），頁54。

20 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海外經濟協力基金三十年史》（東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1992年），頁8-10。

有利推動日本的貿易與技術出口。²¹

綜觀戰後日本國內以自民黨為首的政商關係，可說十分錯綜複雜。戰後許多日本大型的企業集團藉由政治獻金的方式支持特定人士參政，企業為求取得回饋時，政治人物則提供投資訊息與網絡給企業家。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所辦理的經濟議案而言，一方面為日本政府希望藉由外交的力量進行資本輸出。²²在此緣由下，作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日本，固然也將此訊息傳達給友好企業家，邀其前往臺灣投資。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中華民國，並未向日本提出賠償。但1950年代後期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設立時，日本方面因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出席，促使日本資本能運用該組織所建構的網絡進入臺灣，參與臺灣的經建計劃與基礎建設。

若進一步參照外交部檔案中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相關之卷宗，即能確認經濟團體聯合會在歷次會議中均未缺席。初期經濟團體聯合會由常任理事堀越禎三代表出席，但自1960年第四次會議起，改由會長的石坂泰三²³親自參與。²⁴石坂泰三自1950年代後半起，即呼籲日本政府應推行資本自由化政策，藉由拓展國外市場的方式出口過剩商品。²⁵要言之，石坂泰三是在上述的理念下出席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企圖尋求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機會。另外，當時按地域別劃分的日本國內各商工會會議所中，以東京和大阪兩商工會會議所最具規模。東京商工會會議所所長藤山愛一郎與大阪商工會會議所杉道助也都參與了第一次會議。²⁶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會議召開上，最初規劃每年集會兩次，輪流

21 小林英夫，《日本企業のアジア展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0年），頁62-68。

22 有澤廣巳監修，《昭和經濟史（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年），頁211-215。

23 石坂泰三（1886-1975），出生於日本東京府牛込區（今東京新宿區），191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曾服務於遞信省，1915年進入第一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服務，其後於1938-1946年升任社長職務。1949年東芝會社再建的過程中，石坂氏擔任社長，並於1956-1967年兼任經團連第二代會長，發揮其卓越的領導能力，故被稱為日本的財界總理。社團法人日本工業俱樂部，《日本の實業家—近代日本を創った經濟人傳記目錄》（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2003年），頁25。

24 古賀純一郎，《經團連-日本を動かす財界シンクタンク》（東京：株式會社新潮社，2000年），頁245。

25 古賀純一郎，《經團連-日本を動かす財界シンクタンク》，頁180。

26 經濟團體連合會編，《經團連の十年》（東京：經濟團體連合會，1956年），頁6-7。

於東京、臺北兩地舉行，但1961年以後減為每年召開一次。依據張群的說法，其原因為雙方委員平時尚有其他事務，過於頻繁的集會，在沒有時間研究提案下，反而使會議流於形式。²⁷整體而言，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自1957年成立至1972年臺日斷交為止，共舉行16次會議。但是該組織在政治、文化和經濟層面，又扮演何種功能呢？

綜觀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臺灣代表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提案，多圍繞著反共議題。政治方面，由於1950年代起日本開始與中共進行貿易，故臺灣代表多次在會議中向日方代表提出日本政府不應接受中共帶有政治性的貿易政策。在文化方面，第一次委員會議共同聲明中曾以「排除以侵略世界奴役人類為目標之共產主義及共產體制」之宣言，作為雙方合作重要方針之一。²⁸當時臺灣方面代表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提案與反共國策相結合的原因，或許是在兩岸分治的冷戰體制下，臺灣必需爭取與日本作為反共盟友，以獲得國際上之認同。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處理兩國政治間的作為，具體顯現在1963年日本政府批准官方進出口銀行融資維尼龍工廠售予中共，和其後擔任中共油壓機器考察團翻譯周鴻慶欲投奔自由，卻遭日本政府遣返之事件。當時臺灣方面撤回駐日大使館重要外交人員，兩國邦交呈現斷絕局面。²⁹臺日雙方委員都曾努力奔走折衝，尤其日方顧問岸信介與石井光次郎，皆向日本政府當局提出建議和批評。最終促成吉田茂來臺灣訪問，提出『吉田書簡』後，兩國關係才漸告緩和。³⁰

在文化上，臺灣方面除希望日本能策進思想上的反共外，也向日本方面提出能夠簡化臺灣學生赴日本留學的申請程序；日本方面則經常向臺灣當局就開放日本電影和書刊雜誌來臺的每年數量與審核標準進行討

27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27 - 230。

28 谷正綱，〈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頁16、22 - 24、30。

29 三好貞雄，《周鴻慶事件の真相》（東京：株式會社自由アジア社刊，1964年），頁63 - 70。

30 谷正綱，〈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頁35。

論，亦帶有引進日本文化產業之意味。³¹

經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人事安排，能夠瞭解臺日雙方所著重的有所差距。作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臺灣方面靈魂人物的張群，在回憶錄中提及臺灣除希望運用此一組織來與政府外交工作相輔相成，以彌補政府工作之不足外，更希望日方委員能夠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力。但日本方面，則設法降低政治性，反倒重視經濟性的影響。³²

就臺日之間經貿的往來而言，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經常針對兩國間的經濟事務進行協商，作為兩國經貿聯繫的窗口，例如1950年代的記帳式貿易與1960年代如何減少兩國間逆差問題等，皆為該會關心的事務。但在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所推動的各項經濟議案中，最重要的是引進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以支持臺灣推動經建計劃。稍詳言之，臺灣政府透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將經建計劃希望由日方提供的部分傳達給日本。此舉對1950年代後期臺灣在美國援款逐漸減少下，提供相當程度的幫助。³³

參、中日合作策進會與日資之引進

眾所皆知，戰後臺灣的對外經貿關係以美國與日本為主。首先，臺灣與美國的經貿關係，是以1950年6月韓戰爆發為契機，促使美國給予臺灣大量的經濟援助。在對日經貿上，1950年9月政府與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簽訂中日貿易協定，戰後臺日間貿易往來的關係才告恢復；1952年，臺日簽訂了以舊金山合約為基礎的中日和約後，臺日關係宣

31 司馬桑敦，《中日關係二十五年》，頁54-55。〈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六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3，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十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3，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32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31-232。

33 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頁232。

告正常化。³⁴

綜觀美國對臺灣的援助，除了有效減緩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外，1953年臺灣開始實施每四年為一期的經建計劃中，美國也給予資金、物資及技術等各項協助。³⁵但伴隨臺灣經濟的逐漸穩定與美國援外政策的變化，美援的形式由最初的贈與改為貸款，放款金額也逐漸減少。³⁶臺灣為填補經建計劃的資金缺口，開始透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向日本尋求各項奧援。

另一方面，1950年臺日間貿易的重啟，以及1952年中日和約簽署後，伴隨臺日兩國間關係的正常化，日本商人與會社陸續進入臺灣。臺灣要如何提供日本商人便捷的金融平臺，遂成為日本政府關注的焦點。

經由上述簡短的討論，即能瞭解1957年創設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臺灣欠缺資金的背景下，與會的臺灣代表較關注如何引進日本資本，以協助臺灣發展各項經建計劃；日本方面代表則關心在臺投資日本商人的權益。以下，先介紹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如何促成戰後臺灣第一所外資銀行——日本勸業銀行臺灣分行的設立，再對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如何作為引進日本資本之平臺進行闡述。

一、日本勸業銀行臺灣分行的設立

戰後日本的民間貿易要至1949年12月，在盟軍總司令部的許可下重新發足。在此契機下，日本商社開始派遣社員至海外出差，進行商業活動。1950年8月，盟軍總司令部再進一步開放日本商社赴海外設置支店和派遣駐在員。³⁷

1950年9月，臺灣與日本簽定貿易協定後，臺日間的經貿往來逐漸

34 林滿紅，《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臺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頁49-62、83-98。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頁17-20。沈雲龍編，《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社，1988年），頁95-97。

35 經濟部編，〈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之回顧與展望〉《經濟參考資料》（第121期）（1956年4月30日），頁1。葉萬安，《二十年來之臺灣經濟》（臺北：臺灣銀行，1967年），頁62。

36 趙繼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頁24-26。

37 日商株式會社編，《日商四十年の歩み》（大阪：日商株式會社，1958年），頁425-426。

熱絡。日本政府體認到兩國間的商品貿易涉及到貨幣兌換，認為應在臺設立日本銀行分行，以有利在臺日商的匯兌與融資。基於上述的理由，1957年10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時，日本方面代表即提出在臺開設日本銀行分行的請求。³⁸

當時日本認為臺灣銀行在東京和大阪都設有分行，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臺灣當局應允許日本一家銀行在臺灣設立分行。日本方面也聲明此一分行將專營出口票據業務，不從事存款或是與臺灣本地銀行相競爭之業務。³⁹為此，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臺灣代表，先邀請有關機關召開座談會，在獲得財政部長嚴家淦同意日本設立分行議案後，將訊息轉達給日本大使堀內謙介。其後，日本方面主任委員足立正、常務委員堀越禎三、矢次一夫等三人聯名來函，提出已向大藏省推薦與臺灣淵源較深、已在臺灣設有辦事處的勸業銀行，並希望臺灣代表儘快向政府推薦勸業銀行。⁴⁰

1959年3月，財政部核准日本勸業銀行在臺設立分行，業務範圍僅限匯款、開發及收受信用狀、收買輸出匯票、進出口業徵信調查等四項。同年10月10日，日本勸業銀行正式在臺設立據點。⁴¹

綜言之，勸業銀行臺灣分行是在臺日兩國間半官方網絡的政治協商下創設。就性質而論，勸業銀行為戰後臺灣第一家外商銀行，業務僅侷限於服務商人資本的開發性銀行，與一般商業銀行有所不同。

二、1950年代的經建計劃與日本資本

如前所述，1950年代臺灣發展各項經建計劃時，初期資金多仰賴

38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二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49，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39 〈外交部葉部長接見日大使談話要點記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0 〈谷正綱、陳雪屏、鄭道如致黃少谷信函〉（1958年7月26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本報記者集體採訪，〈日銀行設臺分行 原則業已決定 - 業務範圍有適當限制〉《聯合報》（1958年11月24日）5版。〈中日合作策進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 第五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1 〈日勸業銀行 昨開始開業 - 業務收費與臺銀同〉《聯合報》（1959年9月11日），第5版。

美國的援助。然而，1957年美國政府決定將援外預算大幅刪減，臺灣當局認為此舉將排擠到以電力、交通、工礦等大規模開發的經建計劃所需的資金。⁴²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即是在此背景下，希望日本能以較為優惠的方式提供資金借貸與設備採購，填補我方推動經建計劃的資金缺口。

1957年10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時，臺灣代表除了向日本提出能夠對臺灣發展第二次四年經建計劃給予各項援助外，還希望對日採購所需的物料能夠享有較為優惠的付款方式與分期利率。⁴³如表2所示，當時日本願意給予臺灣的計劃可分為8項。⁴⁴

表2：日本給予臺灣第二期四年經建計劃之援助（1957年10月）單位：美金千元

1	大甲溪流域水力發電設備供應計畫	10,000
2	輸配電系統開發計畫	10,000
3	南莊煤礦開發計畫	3,000
4	鐵路擴建計畫	8,000
5	電信系統改善計畫	4,000
6	一般工業擴充計畫	3,000
7	漁業資源開發計畫	4,000
8	漁船建造、漁網織製計畫	2,000
	合計	44,000

資料來源：〈中日合作策進會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六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3，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日經濟合作案進度報告〉（1958年5月3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綜觀上述八項建設，可分為電力、煤礦、鐵路、電信、漁業、其他一般工業等，其中電力部門所需資金最高，約佔總金額的半數。值

42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四十六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1957年1月23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四十六年度第三次會議議程〉（1957年11月14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記錄（一）》，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館藏號：31-01-00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3 〈中日經濟合作案進度報告〉中國方面委員會經濟組修正本（1958年5月3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4 日本輸出入銀行審查部，《海外調查資料（第17號）》（1958年9月），頁78-79。

得注意的是，大甲溪流域水力發電計畫早於1935年即開始規劃，戰後臺灣電力公司除繼續調查外，並於1958年設立探勘處，為開發預作準備。具體而言，此項計畫將在大甲溪中心建造達見水壩與六組水力發電設施，並向日本購買所需資材。⁴⁵至於輸配電開發系統計畫的推動，主要為因應戰後臺灣電力公司的發電量逐年增加，輸配電設備也將隨之擴充。其中，臺灣方面認為電力部門所需金額較大，故向日本提出能夠加長分期付款期間與降低利率。⁴⁶

另外，南莊煤礦與漁業相關計畫，早於中日和約簽署後政府即開始籌畫。綜觀戰後日本鋼鐵煉製所需的焦炭多由美國進口，在運輸成本較高下，日本政府和美國安全總署皆認若能對臺灣的南莊煤礦進行開採，將所產焦炭出口至日本，則有助於日本的工業發展。為推動此項計畫的實現，除了美國安全總署東京分署署長阿托莫洛夫曾赴臺灣洽談外，日本也提出願意派遣專家來臺協助探勘；為此，資源委員會也設立南莊煤田探勘處作為因應。⁴⁷1957年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後，臺灣政府正式向日本方面提出預計在四年內向日本訂購約美金300萬元之器材供南莊礦業公司使用。在營運資金上，則透過日本羽幌會社的引薦，由米星會社貸給南莊礦業公司93萬美元，其中包括等值65萬美元的器材與28萬美元現金。此外，日本方面也願意派遣技術人員來臺協助開發。在還款方面，南莊礦業公司允諾每年生產20萬噸焦炭中，將部分產出銷往日本，並由銷日煤價中以每噸中扣除2美元的方式作為折抵。⁴⁸

在漁業方面，戰前臺灣漁業產量的高峰，為1940年的11萬9千餘公噸。1951年臺灣漁業年產量雖回復至9萬6千餘公噸，但仍低於戰前高峰期。此外，戰前日本本土的年漁獲量曾高達450萬公噸，戰後雖降

45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臺灣電力開發運用美援成果探討》（臺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4年），頁38。日本輸出入銀行審查部，《海外調查資料（第17號）》（1958年9月），頁79。

46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五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7 〈對日經濟合作計劃綱要草案〉，《有關中日合作》，外交部檔案，檔號：11-EAP-0181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48 〈中日經濟合作案進度報告〉中國方面委員會經濟組修正本（1958年5月3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至350萬公噸左右，產量仍居世界第一。中日合約簽署後，臺灣即希望借重日本技術發展漁業。1951年11 - 12月間，在美國安全分署的引薦下，邀請5名日本專家來臺考察漁業。之後日本方面提出由臺灣、日本、美國共同籌組漁業公司，但此一議案並未獲得臺灣與美國認可。⁴⁹

其後於1955年，由政府經營的中國漁業公司、臺灣省水產試驗所與日本永福產業株式會社簽署鮪釣漁業技術試驗合作合約，由日本派遣漁船與技術人員，來臺進行漁業試驗與指導。⁵⁰

在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提出的漁業資源開發計畫中，預定由臺日雙方各出資200萬美元共同籌組漁業公司，開發遠洋鮪釣漁業和經營加工外銷業務。合作對手由雙方代表分別接洽具有能力信譽的公司合作，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也將協助至依法合組新公司為止。⁵¹

其後臺灣方面選擇由政府經營的中國漁業公司，擬運用當時公司委託臺灣造船公司依據日本新瀉鐵工所提供的圖樣和資材建造的四艘350噸漁船，日本方面也允諾將尋覓願意提供同型漁船之漁業公司。然而，後來日本方面提出此項合作計劃也能兼營近海拖網漁業；臺灣方面則認為可分為遠洋與近海漁業分別進行合作。依據資料顯示，最終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並未成功促成此項計劃。⁵²

漁船建造、漁網織製計畫方面，臺灣預計在四年間向日本訂購約值200萬美元的器材。在執行上，造船部分由臺灣機械公司向日本購買所需鋼板、型鋼、鋁條、大型柴油引擎、電氣、冷凍和航海設備等各項器材，並運用該公司已經與日本池貝、神戶製鋼、田熊等公司簽署的技術合約生產。漁網織製部分，最初計劃由日本一個網廠選擇與臺灣廠商小規模合作，但最終於1959年由日本桃井製網株式會社來臺獨資設立以

49 〈對日經濟合作計劃綱要草案〉，《有關中日合作》，外交部檔案，檔號：11 - EAP - 0181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0 〈行政院第四三一次會議議事錄〉（1955年12月1日），行政院議事錄檔案，檔號：105 - 1 689，藏於國史館。

51 〈中日經濟合作案進度報告〉中國方面委員會經濟組修正本（1958年5月3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_EAP - 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2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用籤〉（1957年12月17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 - EAP - 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生產合成纖維漁網為主的桃井製網公司的方式實現。⁵³

1958年6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時，臺灣方面又提出由兩國合辦農業機械公司、人造纖維生產擴充、遠洋船舶建造等三項計劃。⁵⁴

首先，會議中提案由兩國共同籌組農業機械公司時，正逢1950年代臺灣推動土地改革後實施農業機械化政策。我方政府希望能夠自行製造耕耘機，以減低外匯的消耗，故由臺灣土地銀行與日本方面的山岡、井關、久保田三家公司進行協商。⁵⁵最後於1960年促成於臺北和高雄各設立一所農業機械公司。設於臺北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由日本的ヤマーンディーゼル、井關農機公司，與臺灣土地銀行共同設立；高雄的新臺灣農業機械公司，則由三井物產和久保田鐵工，以及臺灣省合作金庫、臺灣省合會儲蓄公司、永豐公司出資設立。⁵⁶

在人造纖維的生產擴充計劃上，1950年臺灣開始推動棉紡織工業的進口替代政策後，1954年工業委員會認為臺灣島內缺乏天然纖維，開始籌畫人造纖維工廠之設立，並於1955年創設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當時該公司對於日本的維尼龍生產極感興趣，希望日本能夠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臺灣設備與生產技術。但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最終並未促成此項計劃的實現。⁵⁷

在第五次會議中，臺灣方面向日本提出籌建鋼鐵廠建設、航業汰舊換新建造新船、擴充遠洋鮪釣漁業計畫、重電工業器材製造等四項

53 〈中日經濟合作案進度報告〉中國方面委員會經濟組修正本（1958年5月3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亞太司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日關係研究會編，《日本在華經濟投資暨技術合作商社概況》（臺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72年），頁16。

54 〈抄谷常務委員等原函〉（1958年8月2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三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0，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5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五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6 臺灣問題研究所編，《臺灣年鑑（1973年版）》（東京：パシフィック・ニュース・サービス（PNS通信社），1973年），頁259。義容集團編輯小組，《臺灣前輩企業家何義傳略》（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年），頁91。彭添松，〈一個老農業機械人的回憶－臺灣農業機械化奇譚〉，<http://www.taiwan-agriculture.org/>。（Taiwan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Center）新臺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stam.com.tw/asp/kcompany.htm>（2012年1月31日）

57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六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計畫。在籌建鋼鐵廠建設計劃上，1960年代政府尚未將經營不善的唐榮鐵工廠收編國有前，臺灣鋼鐵業的生產多集中在民營部門。⁵⁸政府於1950年代推動第二次經建計劃時，即規劃運用外資的力量發展重工業。⁵⁹因此，臺灣代表在第五次會議中向日本方面提出希望能夠給予籌建一貫性鋼鐵廠計劃之援助後，日本富士製鐵株式會社也派遣專家來臺灣進行調查，評估建廠的可能性。但依資料顯示，此項計劃最終並未實現。⁶⁰

航業汰舊更新造新船計劃上，由於臺灣要至1960年代後期才具備系統性建造大型貨輪之能力，在此之前臺灣所需的貨輪，幾乎都向日本訂購。在此項計劃中，臺灣預定向日本購買8艘大型貨輪，分別為3,600噸級2艘、5,500噸級2艘、12,500噸級3艘、15,000噸級1艘。至於擴充遠洋鮪釣漁船計劃方面，戰後臺灣遠洋鮪釣漁業的發展，多仰賴自日本引進技術。中國漁業公司再以擴大業務為考量下，向日本添購550噸漁船兩艘。⁶¹

重電工器材製造計劃方面，起因於臺灣電力公司每年均需向國外購買200萬美元左右的變電和輸配電設備。政府為推動重電工業器材的自製，希望由生產機電產品為主的大同公司負責生產。在此機緣下，大同公司總經理的林挺生亦受邀參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並結識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同時擔任東芝社長的石坂泰三。藉由此一網絡的聯繫，除促成1960年9月大同機械公司與東京芝浦電氣會社簽訂合作計劃，東芝公司除提供生產變壓盤和配電盤所需技術外，還引進資金對大同公司進

58 許雪姬，〈戰後臺灣民營鋼鐵業的發展與限制（1945 - 1960）〉，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時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頁293 - 337。

59 《立法院審查第二期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檔案，檔號：31 - 01 - 07 - 006，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0 〈經濟組報告第五次中日全體委員會議決案進行情形〉（1961年1月1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八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 - EAP - 01755，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1 〈經濟組報告第五次中日全體委員會議決案進行情形〉（1961年1月1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八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 - EAP - 01755，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行投資。⁶²由此可見，透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網絡，不僅實現臺灣電力事業設備的進口替代，也促成日本東芝公司與大同公司往後的長期合作。

1950年代後期，臺灣在美援減少的衝擊下，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向日本尋求資金與設備，作為填補經建計劃的資金缺口，在此同時，也引進日本的資金與設備。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提出的計劃中，除了因應我方經建計劃所需外，也扮演兩國間資本流通的橋樑。例如當時我方無力生產的船舶，故希望日本能提供較為優惠的付款方式；在漁網製造、籌組農業機械公司、重電工器材等項目，均是我方以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化為考量，促成日本方面以直接投資、合資，或是技術轉讓等各種方式進行生產。就日本方面而言，也透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網絡達到資本和技術輸出的功效。

然而，在資本與技術引進的過程中，需要兩國間的政府、企業、資金等諸多要素的配合。然而，官方和民間資金均有限的情況下，未必有足夠的資金得以參與投資；部分日本企業也未必對臺灣政府提出的投資計劃有興趣，以致部分提案未獲執行。

肆、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與日圓貸款的締結

1965年6月30日美援結束後，同年7月1日日本對臺灣給予1億5,000萬美元的貸款。過去劉進慶曾就日圓貸款的政治性意義進行論述，本稿則進一步對日圓貸款的形成背景與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其次，並對日圓貸款對公營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及其在戰後中日資本流入過程中的意義進行論述。

一、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與日圓貸款的促成

62 〈經濟組報告第五次中日全體委員會議決案進行情形〉（1961年1月10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八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5，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劉益昌、林祝菁，《林挺生傳》（臺北：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141-143。

1960年代初期政府推動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時，所需資金約12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政府計劃以新臺幣支付，剩下三分之一需仰賴外匯支付。當時因美國對臺所給予的經建計劃援款逐漸減少，加上政府將多數外匯挪用於進口物資，擠壓到經建計劃之資金，臺灣在欠缺外匯的情形下，不得不向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求助。此外，1961年臺日之間記帳貿易制度廢止，臺灣政府為維持兩國間的貿易平衡，亦亟欲增加對日採購。有鑒於此，我國政府提出向日本輸出入銀行和日本經濟協力基金兩方借款之構想。⁶³1961年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時，臺灣方面代表向日本探詢是否能提供臺灣官方或民間信用貸款、進出口金融貸款，或是等同於東南亞國家的日圓貸款的可能性。⁶⁴

1961年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七次會議時，臺灣代表除了再次向日本明確提出能夠以日本海外協力基金等機構貸款給臺灣外，也希望日本輸出入銀行能貸與臺灣500萬美元的長期貸款，供作公民營事業向日本採購器材所需資金。⁶⁵

1962年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赴日與首相池田勇人等官員會晤時，正式向日本政府洽談貸款之可行性。當時日本政府提出願意貸款4,500萬美元給臺灣，其中1,000萬美元貸給政府，3,500萬美元貸予民間。但進入協商階段時，因日本政府核准由日本輸出入銀行支持倉敷螺旋株式會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整套維尼龍設備，以及周鴻慶事變的相繼發生，使得臺日之間的外交關係陷入低潮。另一方面，又加上尹仲容逝世，日圓貸款的提案亦無疾而終。⁶⁶

1964年2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為緩和兩國關係緊張而訪臺，在此

63 李國鼎，〈對於日本經濟成長及商談經濟合作情形報告〉（1961年2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八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5，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四十六年第三次會議記錄〉（1957年11月14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記錄（一）》，美援會檔案，檔號：31-01-00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4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八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5，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5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報告書〉，《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十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7，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6 〈歷年來與日本接洽貸款情形節略〉（1964年6月），李國鼎檔案，檔號：b0056100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梁琪，〈中日長期貸款協定之經緯〉，《中國與日本》66期，1965年5月1日，頁4-5。

機緣下再次提出願意促成日圓貸款。⁶⁷隨後日本又派遣外相大平正芳來臺，兩國外交才逐漸恢復正常。同年8月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訪問日本時，日本除允諾願意提供長期低利貸款外，並提出即將召開的第九次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議日本將以三井集團重役佐藤喜一郎擔任團長。此外，顧問岸信介和石井光次郎等大老皆允諾出席。經由此人事佈局，或能顯現出日本方面對日圓貸款的重視性。⁶⁸

此時，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雙方代表預計第九次會議於1964年10月27在臺北召開，但因首相池田勇人在會議召開前發現罹患喉癌請辭。日本國內在涉及到政府改組，不僅日圓貸款的協商談判暫停，會議也暫緩召開。其後佐藤榮作繼任首相後，表示將對臺灣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援助採取更積極的方針，日圓貸款之計劃持續進行。⁶⁹

1964年12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召開第九次會議，日本方面也明確提出願意協助臺灣發展第四期經建計劃中所需的資本和技術。另外，此次會議召開日本所參與的代表，多為日本工商界重要負責人。除了首席委員佐藤喜一郎為三井銀行社長與三井系的重役外，其他參與者尚有三菱商事、三菱電機、伊藤忠商事、石川島播磨重工業、三井物產、富士製鐵和經濟團體聯合會等重要代表。探究日本商界人士出席的動機，則是希望能夠在日圓貸款的簽署後，將物資或設備銷售至臺灣。⁷⁰

此外，同時期日本內部曾對給予臺灣的援助，應以贈與或貸款的形式實施進行爭論。任職於日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局長西山勉指出，臺灣以中華民國之名義於聯合國擔任常任理事國，若依低度開發國家條件給予臺灣贈與性的經濟援助，將有失妥當。最終，外務省決議以貸款方式

67 〈歷年來與日本接洽貸款情形節略〉（1964年6月），李國鼎檔案，檔號：b00561002，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68 梁琪，〈中日長期貸款協定之經緯〉，《中國與日本》66期，1965年5月1日，頁4-5。

69 梁琪，〈中日長期貸款協定之經緯〉，《中國與日本》66期，1965年5月1日，頁4-5。

70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雙方常務委員懇談記錄摘要〉（1964年3月16-17日）。外交部亞太司檔案《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第七冊》，外交部檔案，館藏號：11-EAP-01754，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梁琪，〈中日長期貸款協定之經緯〉，《中國與日本》66期，1965年5月1日，頁4-5。

對臺灣提供援助較為恰當。⁷¹1964年10月21日，日本外務省派遣經濟協力課課長岡田晃及大藏省財務調查官村井七郎訪問臺灣，與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針對日圓貸款過高及相關事宜進行協商。⁷²

經過兩次的商談，日方明確表示願意與我方簽訂一項5年合約，每年對我國貸款3,000萬美元，共計1億5,000萬美元的貸款。在執行方法上，每年年初由雙方合組之委員會核定後，由臺灣方面通知計畫承辦單位向日方採購設備。在貸款對口單位方面，日本由進出口銀行總裁出面，我方則由政府出面。日本要求臺灣當局除應提列完整的貸款計畫外，並希望臺灣能自日本採購資本財，至於消耗財則排除在貸款計劃中。⁷³

經由上述會議的商談與交涉，1964年12月，李國鼎陪同當時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嚴家淦出訪韓國的回程中，順道前往日本與大藏省進行會談，達成日圓貸款的具體協議。⁷⁴1965年3月12日日本內部的的外務、大藏、通產省和經濟企畫廳達成對臺灣貸款之協議後，同年4月26日，由當時擔任經濟部長的李國鼎與日本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代表兩國政府就日圓貸款的簽訂在臺北換文。⁷⁵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瞭解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日圓貸款簽署的過程中扮演穿針引線的作用。就執行上而言，兩國政府先藉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傳達雙方政府之訴求，以建立日圓貸款政策之基本共識。此後，才進入政府間的談判與協商階段，並交由高層定奪。另一方面，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日方代表，則在會議期間邀請日本廠商與會，藉由

71 國家安全局公文，（五三）務真0366號，〈日本對低開發國家之經濟援助計畫綱要〉，1964年10月10日《中日經濟合作》檔號：031 3，外交部亞太司檔案。

72 密件，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大使館（代電）受文者：外交部，1964年10月16號，日經（53）字第3002號，《中日經濟合作》檔號：031 3，外交部亞太司檔案。

73 葉學哲，《國際資金流入》（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1年），頁27-31。〈與日方洽商貸款問題簡報〉（1964年11月2日）《中日經濟合作》檔號：031 3，外交部亞太司檔案。

74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整理，《李國鼎：我的臺灣經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134。

75 外務省經濟協力局，《經濟協力特別資料（その一）》（1969年6月）（秘密，無期限），頁1-3。〈日本貸款案之洽談情形〉（1965年3月17日）《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 日圓貸款卷》檔號：36-08-027-001。

此一組織作為與臺灣政府與公營事業間的交流平臺。

二、日圓貸款的分配使用

眾所皆知，戰後臺灣所獲得各項的外來援助與借款中，以1950年起至1965年的美援佔了外來資金極高的比例，並對當時臺灣的國際收支及物資供應極大的幫助。⁷⁶如表3所示，在美援停止前，政府向其他國家尋求的金援中，以日本所給予的援助最大。

表3：先進國給予臺灣的經濟援助

援助國	金額（美金千元）	時間
美國	1,447,800	1951 - 1968
日本	66,480	1965 - 1968
西德	2,860	1966 - 1968
加拿大	2,790	1966 - 1968
義大利	2,014	1964 - 1968
澳大利亞	749	1966 - 1968

資料來源：松本繁一，《諸外國の臺灣援助と日中關係》（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0年），頁11。

如表4所示，日圓貸款的項目，主要為基礎工程與公營事業兩部分。在基礎工程部分，戰後臺灣的基礎工程多仰賴戰前日本人留下的設施，此一現象要至1960年代臺灣經濟進入10%的年成長率後，政府才開始大規模籌畫港口擴建、橋樑和公路興建、交通運輸工具之改善和水庫興築等各項事業。⁷⁷在公營事業上，日圓貸款的資金主要集中在以電力、肥料、製糖等事業，提供各生產單位更換與擴充設備。以下，將對日圓貸款為這些產業所帶來的影響，分別進行討論。

⁷⁶ 趙既昌，《美援的應用》，頁7-9、91-93。

⁷⁷ 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東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1970年），頁67。

表4：日圓貸款的使用分配

單位：美金千元

基礎工程			
用途	細目	金額	比率
道路	臺北大橋改建	15,900	10.6
港口	高雄港擴建、基隆港擴建	12,497	8.3
電力	下達見水力發電、輸配電改善	32,413	21.6
電信電話	電訊擴充	3,550	2.4
水壩	曾文水庫	30,000	20.0
航空輸送	民航局運輸機補充	3,150	2.1
小計		(65,037)	(43.4)
公營事業			
電力		32,413	21.6
鋼鐵	唐榮鐵工廠設備改造、唐榮合金鋼廠、唐榮鑄造廠	7,172	4.8
肥料	建立臺肥液氨廠、建立臺肥尿素硫酸氨廠、建立臺肥硫酸廠、臺肥一般設備改良	17,614	11.7
製糖	臺糖設備更新、臺糖專用碼頭	10,635	7.1
機械	臺機設備改進	2,001	1.4
鉛業	臺鉛設備改良	2,400	1.6
造船	臺船擴充	3,200	2.1
紙漿	臺糖蔗漿廠	10,000	6.7
小計		85,413	56.9
總計		150,472	100.0

資料來源：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東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1970年），頁67。

首先，電力事業的兩個項目，或可視為1950年代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臺灣向日本方面提出計劃的延續。其中，位於大甲溪流域為主的下達見水力發電事業，與1950年代政府規劃的達見水壩帶有密切關連。在1950年代後期，政府預計先在上游的達見水壩地區興建發電廠，但因資金不足使得此項計劃無法順利完成。1963年美援調查團對臺灣的電力發展計劃重新檢討後，決定先對大甲溪下游進行開發。在所需金額龐大下，故由日圓貸款、美援貸款、中美基金、臺電公司自有資金四方共同集資。在分工上，此項計劃的電廠工程的設計與監工交由美國Harza Engineering公司負責，美援款項用於採購建設與搬運時所需之重型機具，日圓貸款則向日本購置發電用設備。綜言之，下達見計畫可說是由冷戰體系下的國際分工共同完成，此項工程除確保臺灣尖峰時間的

電力供給能力外，更進一步降低發電的成本。⁷⁸

關於輸配電設備改善計劃，日圓貸款又帶來哪些貢獻？臺灣電力公司的發展承襲了日治時期的設備作為基礎，戰後藉由美援的引進，成功地提升臺灣的發電量和輸配電能力。然而，1950年代美援電力計劃實施的同時，並未同時對既有的機械與設備進行整合，使得公司的機械與設備包含美國、日本和歐洲等不同系統。⁷⁹日圓貸款提供的輸配電計劃，除了對既有的198個變電所進行擴張外，還新設30個變電所。然而，日圓貸款對於此項計劃的最大意義，是將過去各種其系統與設備加以改善與全面性地整合，使得臺灣的電力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傳輸。⁸⁰

在肥料事業方面，戰後臺灣的肥料工業雖接受美援的挹注使得生產量大幅提昇，但至1960年代前期臺灣的肥料仍需仰賴進口。日圓貸款對於臺灣肥料公司最大的意義，可說藉由新設備的添購，大幅度提高臺灣肥料的自給率。臺灣肥料公司經由日圓貸款計畫支援的廠房的擴充計劃完成後，使得臺灣所需肥料除了鉀肥料仍需仰賴進口外，其餘皆能夠由國內供應。⁸¹在此同時，除了尿素的出口量大幅提高外，複合肥料、硫酸銨、液氨、硫酸銨等肥料自1960年代末期起開始有多餘的產量進行外銷。⁸²透過上述的討論，當可瞭解日圓貸款可說是促成臺灣肥料工業完成初步的進口替代階段。

78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Lower Tachien Project〉（Applying for Japanese Loan through CIECD）（1965年9月13日），《臺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計畫、下達見水力發電工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檔號：36-08-041-00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東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1970年），頁92-94。

79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臺灣電力開發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4年），頁50、57、58。王松齡，〈臺灣之電力工業〉，《臺灣之工業論集 卷四》（臺北：臺灣銀行，1968年），頁13。

80 〈Project Description: Transmisson and Distribution Project〉（Applying for Japanese Loan through CIECD）（1965年9月13日）《臺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計畫、下達見水力發電工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檔號：36-08-041-00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頁95-96。

81 臺灣肥料公司，《臺肥四十年》（臺北：臺灣肥料公司：1986年），頁41-43。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外務省經濟協力局：1970年11月），頁112-115。

82 臺灣肥料公司，《臺肥四十年》（臺灣肥料公司：1986年），頁47-8。尿素自1969年起出口量由前一年的4,731,500千噸提升為102,552,500千噸，複合肥料自1967年起開始外銷，液氨於1968年起開始外銷，硫酸銨自1970年開始外銷。

在製糖事業方面，臺灣糖業公司的生產設備多數自日治時代開始使用，至1950年代時的使用年限大都達30至50年，開工期常因機件損壞而停工。⁸³為此，1958年臺灣糖業公司在經濟部的核准下訂立十年更新計畫，預計投資1,727萬美元和新臺幣3億4,712萬5,000元進行設備更新。⁸⁴但1958年11月政府實施單一匯率制度後，因美援貶值導致新臺幣需求量增加，原定的資金計畫也不敷使用。⁸⁵故自1958年起至1965年的前8年間，僅完成計畫之47%。⁸⁶

1965年臺灣糖業公司在同時獲得日本貸款與中美基金的貸款挹注下，編定〈十年更新計畫加速計畫〉，使得十年更新計畫能於1967年準時完成。在資金的運用上，日圓貸款主要用來向日本企業購買製糖設備和鐵路車輛等，中美基金貸款則向公營的臺灣機械公司購買製糖設備。⁸⁷由此可見，日圓貸款可說是填補了臺灣糖業公司設備更換所需資金。臺灣糖業公司藉由設備的更新，除提升製糖過程中的生產效率及製糖率之外，高雄總廠橋頭工廠從甘蔗搬運到產品包裝也全數達成自動化生產。⁸⁸

藉由上述的討論，能夠瞭解1960年代臺灣的公營企業如何在自有資金與美援減少的背景下，運用日圓貸款提供的資金與技術進行設備更換。然而，就日圓貸款所提供的電力和機械等項目，早在我國政府推動第二期經建計劃時，即透過中日合作策進會促成日本對我方貸款。因此，日圓貸款並非僅如同劉進慶提出作為美援的接續之政治性意涵。事

83 〈為本公司十年更新資本支出計畫工務部分計畫內四項設備擬採分期付款辦法所需外匯請惠核由〉（1958年5月17日），《臺糖十年更新計畫第一、二年計畫》，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檔號：35-25-14 18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84 〈為行奉本公司十年更新資本支出計畫第二年計畫及所需外匯美金及新臺幣資本支出預算請鑒核示遵行〉（1959年5月27日），《臺糖十年更新計畫第一、二年計畫》，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檔號：35-25-14 181。〈臺灣糖業公司五十七年度公司會議檢討〉1968年6月《臺灣糖業公司五十七年度公司會議報告資料》，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檔號：35-25-14 113，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85 抄經濟部令〈關於糖業四年計畫及今後經營之方針令仰遵辦具報〉1959年5月26日，經臺（48）工聯第07860號，《臺糖十年更新計畫第一、二年計畫》，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檔號：35-25-14 18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86 臺灣糖業公司，《臺糖五十年》（臺北：臺灣糖業公司：1996年），頁141-142。

87 〈臺灣糖業公司五十七年度公司會議檢討〉（1968年6月）《臺灣糖業公司五十七年度公司會議報告資料》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檔號：35-25-14 113。

88 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頁45、110-111。

實上，提供臺灣經建計劃的日本資本，自1950年代後期即陸續抵達。

伍、結論

戰後，臺灣急欲推動經濟建設的重建與發展時，在欠缺資金與技術下，必需仰賴外國的援助。但在「一個中國」的政策下，對外經貿活動屢屢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阻撓外，許多國家面對敏感的兩岸問題，也多以自身利益為前提。為有效推動對外政經發展時，非官方組織因而應運而生。

本稿旨在探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在1950年代後期美援漸減的情形下促成日資來臺之緣由與發展。過去提及1950年代臺灣所接受的外來援助時，大多謳歌美援的重大貢獻，忽略日本方面的角色與影響。但透過本文可知，日資早於1950年代後期即在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斡旋下，開始參與政府推動的各項經建計劃，更帶動部分日本企業來臺投資。

1950年代日資進入臺灣之時，不難發現存在推力、拉力兩種力量。就拉力而言，由於日本歷經1955年的高度成長，在體認到國內市場有限下，進而透過臺日兩國間的政經網絡與日本內部的政商關係，成功地將日資引進來臺。從拉力來看，臺灣在1950年代末期美援漸減的背景下，透過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網絡，作為日本資金與技術進入臺灣的媒介。

至於1965年簽署的日圓貸款，也是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擔任先導性工作後，才進入正式談判階段。劉進慶認為日圓貸款的實施點恰好接替美援結束，在承接美援對國民黨政權的援助性軌跡下，可說深具政治性意義。但若對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成立即努力促成日資來臺參與經建計劃的歷史脈絡來看，或許臺灣經建計劃的對日依賴早自1950年代後期即以成立，故劉進慶的論點尚有待商榷。另外，過去研究多指陳美國對臺灣的援助至1965年才告終止。但就工業部門而言，自1950年代

後期起美國所給予的援款即逐漸減少，而日資的重要性則逐漸提高，顯示過去對美援的角色及影響似有「過大評價」之虞。

另一方面，1950年代政府藉由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引進日資投資臺灣的經濟建設，並促成廠商間的技術移轉，可說是藉由「非市場經濟」的方式促成，與過去對臺灣因勞動力品質優越、制度健全、產業政策等因素引來外資之論點，或許有待修正。

徵引書目

《外交部檔案》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檔案》

《行政院議事錄檔案》

《李國鼎檔案》

《經濟部國營事業司檔案》

《聯合報》

三好貞雄

1964 《周鴻慶事件の真相》。東京：株式會社自由アジア社刊。

小林英夫

2000 《日本企業のアジア展開》。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編

2009 《日臺關係史（1945 - 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中日關係研究會編

1972 《日本在華經濟投資暨技術合作商社概況》。臺北：中日關係研究會。

日本輸出入銀行審查部

1958 《海外調查資料（第17號）》。東京：日本輸出入銀行。

文馨瑩

1990 《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 - 1965）》。臺北：自立晚報。

王松齡

1968 〈臺灣之電力工業〉，《臺灣之工業論集 卷四》。臺北：臺灣銀行。

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

石井光次郎

1976 《回想八十八年》。東京：カルチャ出版社。

司馬桑敦

1978 《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合報社。

古賀純一郎

2000 《經團連－日本を動かす財界シンクタンク》。東京：株式會社新潮社。

外務省經濟協力局

1969 《經濟協力特別資料（その一）》。東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

外務省經濟協力局

1970 《對中華民國經濟協力報告書》。東京：外務省經濟協力局。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

1964 《臺灣電力開發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池尾愛子

2008 《赤松要：わが体系を乗り越えてゆけ》。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谷正綱

1968 〈中日關係與中日合作策進會〉，沈鄴鼎編，《為張岳軍先生八十壽－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出版不詳，1968。

沈雲龍編

1988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社。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整理

2005 《李國鼎：我的臺灣經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日本工業俱樂部

- 2003 《日本の實業家—近代日本を創った經濟人傳記目錄》。
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

有澤廣已監修

- 1980 《昭和經濟史（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林滿紅

- 2008 《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臺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

海外經濟協力基金

- 1992 《海外經濟協力基金三十年史》。東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

梁琪

- 1965 〈中日長期貸款協定之經緯〉，《中國與日本》66。

許雪姬

- 2006 〈戰後臺灣民營鋼鐵業的發展與限制（1945 - 1960）〉，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時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編

- 2003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張群

- 1980 《我與日本七十年》。臺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

彭添松

- 2000 〈一個老農業機械人的回憶 - 臺灣農業機械化奇譚〉，
<http://www.taiwan-agriculture.org/>。（Taiwan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Center）（下載日期2012年1月31日）

新臺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 時間不詳 〈公司簡介〉，新臺灣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stam.com.tw/asp/kcompany.htm>（下載日期2012年1月31日）

黃天才

1995 《中日外交的人與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黃朝琴

1981 《我的回憶》。出版地不詳：黃陳印蓮。

經濟部編

1956 〈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之回顧與展望〉《經濟參考資料》121。

經濟團體連合會編

1956 《經團連の十年》。東京：經濟團體連合會，。

義容集團編輯小組

2003 《臺灣前輩企業家何義傳略》。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葉萬安

1967 《二十年來之臺灣經濟》。臺北：臺灣銀行。

葉學哲

1981 《國際資金流入》。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臺灣肥料公司

1986 《臺肥四十年》。臺北：臺灣肥料公司。。

臺灣問題研究所編

1973 《臺灣年鑑（1973年版）》。東京：パシフィック.ニュース.サービス（PNS通信社）。

臺灣糖業公司

1996 《臺糖五十年》。臺北：臺灣糖業公司。

趙繼昌

1985 《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劉益昌、林祝菁

2008 《林挺生傳》。臺北：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鴻綺

2005 《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 - 1961）》。臺北：稻鄉出版社。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

1992 《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

瞿宛文

2009 〈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4期，頁49 - 93。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for
Promo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Taiwan

Sao-Yang Hong

National Taitung Colleg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ment about organization, how to assist the economic planning of Taiwan. During later 1950s the U.S. Aid gradually reduced, Taiwan used the network of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to introduce Japane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s we know, Japanesse Loan who signed in 1965 also promoted by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our research result, we find the economic planning who depended on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of Japanese dued to the later 1950s. Furthermore, the U.S. Aid offered to the Taiwan' s industrial sector gradually reduc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Japanese capital was observed. In this situation, we may suggest the past research about the role and impact of U.S. Aid who had over-eval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C. government introduced Japanese capital to invest the economic planning in Taiwan, and promote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se accidents achieved by non-market economy method. Thus, we may revise the past argument who the high level labor force, well institu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caused the source of foreign capital.

Keyword : 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Taiwan-Japanese relations, U.S. Aid, Japanese Loan, foreign
investment